

國共內戰時期

鄭樹森 黃繼持 盧瑋鑾 編

香港文學資料選

(一九四五——一九四九年)

本書主要內容包括國共內戰時期香港文學的背景、「文化漢奸」問題、方言文學、左翼文藝政策、「反動文藝」批判等，並有一份詳盡的該時期香港文學年表，對於香港文學史的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資料。

正文前的「三人談」，對編選準則與有關資料的背景、意義分析甚詳，也別具啟示作用。



國共內戰資料選
港文學資料選

(一九四五—一九四九)

鄭樹森 黃繼持 盧瑋鑾 編



本書獲香港藝術發展局資助／書中言論並不代表該局立場

國共內戰時期香港文學資料選

編者：鄭樹森 黃繼持 盧瑋鑾

出版：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東109-115號智群商業中心十三字樓

電話：2528 3671 圖文傳真：2865 2609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三十號地庫（門市部）

電話：2528 3605 2865 0708 圖文傳真：2861 1541

承印：亨泰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柴灣利眾街27號德景工業大廈十字樓

電話：2896 3687 圖文傳真：2558 1902

發行：利通圖書有限公司（港澳）


九龍紅磡民裕街41號凱旋工商中心8樓C

電話：2303 1010（13線） 圖文傳真：2764 1310

© COSMOS BOOKS LTD. 1999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一九九九年·香港



智識淵海

天地圖書公司
戊寅送堂



門市部：灣仔莊士敦道三十號地庫及一樓
電話：二八六五〇七〇八 圖文傳真：二八六一一五四一
營業時間：上午十時至下午七時

國共內戰時期（一九四五—一九四九） 香港文學資料三人談

鄭樹森：鄭 黃繼持：黃 盧瑋鑾：盧

（一）編選報告

（二）年表的意義

（三）背景

（四）「文化漢奸」問題

（五）方言文學

（六）左翼文藝政策

(七)「反動文藝」批判

(八)《白毛女》在港演出迴響

(九)小結

(一) 編選報告

鄭：首先談國共內戰的上下限問題。現在把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定為國共內戰時期，為中、英文重要專論的上下限。在中文專論裏，徐中約、魏宏運都以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為國共內戰的上下限。在英文專論裏，Lionel M. Chassin, John Melby, Suzanne Pepper 等亦然。至於 Ranbin Vohra 作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九年及 Conrad Schirokauer 作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九年屬特例。此外，撰寫過多種敘述性中國現代史的費正清 (John Fairbank) 及史景遷 (Jonathan Spence) 也從衆，採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之說。費、史兩人著作特別風行，各有兩本敘述性的中國現代史通論，都以此作為上下限。就內戰上下限的界定，我們也請教過專研汪精衛及國民黨黨史的王克文教授，他也支持採用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即自抗戰勝利至中共建政前後，是目前史學界通用的上下限。因此，我們在過濾及選取材料時，是以這個上下限為標準。

黃：我們這次所選取的作品出版時期，是從香港光復至中華人民共和國立國前後，即從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至一九四九年底。嚴格來說，國共內戰實際上是由一九四六年夏天蔣介石向解放區發動全面進攻開始的。日本投降後的一年間，國共兩黨還作過若干程度的和談及商議，一九四五年的「雙十協定」曾帶來了和平的希望。可是兩黨其實各自進行軍事部署，到明年東北問題和平解決不了，國共全面內戰便不可挽回了。因此，如以嚴格的軍事衝突來界定，國共內戰是從一九四六年夏天至

一九四九年底，而學術界則有人把肇始時期上溯至一九四五年乃至抗戰期間，認為其來有自。

鄭：根據中共方面的看法，他們認為談判也是鬥爭的一種，和談也是戰爭的一種，所以史學界視抗戰勝利後及各種談判為雙方衝突的前奏，事實上雙方都打算作全面的軍事衝突，但仍各自在衡量行動的時機。

黃：在軍事衝突前，宣傳陣地、文化陣地一早已開始角力。一九四五年九月，中共中央已致電中共廣東區委，指示立即派遣幹部前往香港廣州，佔領宣傳陣地。原東江縱隊《前進報》社長楊奇，率六名記者趕赴香港。

盧：一九四五年九月，饒彰風也已來港。

黃：同年十一月，中共廣東區委機關報《正報》在港創刊，楊奇任社長。十二月，香港新民主出版社成立。佔領香港宣傳陣地，早在內戰爆發前便已見端倪。到軍事衝突正式開始，加上幾次局勢動蕩，大批文化人南來香港，形成了一九四七至一九四九年在香港的文學藝術活動突然蓬勃。我們本集選取的作品，也可視為當時內戰在文學上的配合和反應，標題中的「國共內戰時期」可作如是解釋。

盧：我想談談在編選過程中所遇到的困難。第一是這時期的出版物眾多，包括報紙副刊、以叢書形式出現的刊物、各種以單期形式而實際上有系列性的作品等，這些眾多的出版資料，除了少數以外，其他的出版時期都很短，有時出版一兩期便更改名字，因此整理時便發現很多混亂的地方，特別是它們的名字。例如《野草》出版了一段時間，就以各有獨立名字的叢書形式出現。第二：由於當年因人手變動、時局不穩等原因，刊物出版得很匆忙，有些期號很凌亂。第三：這些短期以文藝形式出

版的刊物，編者多不曾作系統說明，所以其背景、起始便成爲我們的「缺門」。第四：這時期出版的書刊每期印數不多，銷路也窄，至今能見的不全，我們不想只靠手頭所有的書籍或期刊，作爲研究該社團或社群的全部面貌。第五：作者的筆名衆多，也造成研究困難。這時候可能因爲政治關係，也可能因爲一個人寫很多文章，不方便用同一個名字發表，所以一版之內的不同名字，可能是出自同一個人之手。有些甚至連作者自己也忘記了，例如：端木蕻良曾用過很多筆名，他在晚年忽然想起，才告訴我們。爲了統一計，我們即使知道某個筆名屬誰，也不會標示出來，這是爲了避免掛一漏萬，影響日後的研究者，混淆他們的視聽。第六：報紙的欠缺。我們所選的作品常輯錄自報刊，但許多報紙是不齊全的，我們只能參考圖書館館藏或個人所有，例如：我們要研究「文協港粵分會」的活動，便要參考他們出版的《文協週刊》，但《文協週刊》有段時期刊登在《人民報》，我們找不到《人民報》，這部分便只能從闕，要待日後的研究者再作補訂。

黃：按照現存資料來看，左翼的活動幾乎佔絕大部分。

盧：因爲當時左翼活動儼然是香港文壇活動主流，所以《國共內戰時期（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香港文學資料選》所選取的資料，無可避免必集中在左翼。這時期來港的文化人，除了偶涉文學創作或評論外，極多是政治宣傳表態的行爲。

（二）年表的意義

鄭：年表收錄了不少表面上與文學無直接關係的活動，但往往可藉此窺見當時的一些文化現象，例如文學界在四十年代後期幾乎變成政論界，對政治的興趣、介入似遠比創作還大。由此可理解四十年代後期文學的政治化、左翼化及政策化。也正因為年表可供前後上下參照，才可看出當時不少香港本地作家遊離於中原居港文人的政治事務之外。此外，連國外文人來港訪問或過港都可在比對參照下，看到政治化的傾向並不是當時香港文壇的特殊現象。例如英國歷史、軍事小說家狄切爾訪港搜集資料，結果也在公開講話中「譴責蘇聯支持中共」破壞世界和平，讓我們看到當年東西冷戰開始後的對抗，連一些外國作家也不得不表態，甚至是「選邊」。通過這年表也可看到，如港英政府在一九四九年開始擔憂左派勢力抬頭，利用社團重新登記法例來關閉左翼團體，一方面是港英自身的憂慮，另一方面也是東西冷戰在香港具體而微之反映。換言之，文化現象之外，整個大背景、大形勢，對文學的間接支配及影響，年表是「登高望遠」之基礎。

盧：這個年表與其他年表一樣，我們搜集的材料來自各種報刊所載的活動，所以是不全面的，可能有些活動、有些人的活動往往不見報，因此年表的讀者應該小心。

黃：報刊所見的只是部分作家、社會人士的活動。這時期的社會政治討論較熱烈，左派的宣傳活動尤多，政論與文藝往往交纏在一起。關於文學活動及出版情況，年表則已盡量揭示，尤其是登在《華商報》、《新生日報》、《新生晚報》的材料，力求周備。如《華商報》中谷柳、司馬文森等人的作品發表起訖日期，如《新生晚報》中《經紀日記》的始刊，皆可查到。從年表可以看到，一九四七年後期至一九四八年，香港有較多作品出現。另外，關於半通俗的作品，我們也有注意，記錄了

傑克、望雲等人作品的發表起訖日期。《國共內戰時期（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香港本地與南來文人作品選》中沒有選錄的作品，年表可以提供一些線索。因此年表雖或欠周備，但多少可與《國共內戰時期（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香港本地與南來文人作品選》互為補充。

（三）背景

盧：內戰時期香港文壇的背景資料很多，但我們必須有所選擇。而選擇就以剛才提到在編選過程裏所關心的事情作重點，我們選取文學社團成立的宣言或刊物的創刊辭，是希望顯示從事這些活動的人的一些立場和意念，也表示可用這個意念來檢查他們以後的活動。第二，我們也選擇了相當多社會文化、社會生活層面的資料，以對當時香港社會的某些層面，作一定程度的反映。第三是這時期由於政治原因，某些人和某些社團有極微妙的關係，我們必須配套來看，如背景部分第一項《文協復刊小語》，是刊登在《新生日報》的，這是抗戰勝利後，第一個較為清楚的文藝人活動，由戴望舒主持，以得到重慶總會認可而組成的「文協香港通訊處」的名義主編的。但不到半年，因為有人另外組織一個「港粵分會」，並向總會報告戴望舒附敵事件，戴望舒所編《文協》便立刻消失。這件事，我們除了在背景部分第一、二篇可以看到，還要配合「文化漢奸」部分第二篇文章，才可看到兩會之間明爭暗鬥的情況。第四是衛理的《香港的側面》，這篇文章原刊於上海的刊物，實際上作者丁景唐那時已身在香港，文中充分看到一個外來者如何觀察當時香港的社會情況，所以破例選取

了。在背景部分，我們希望能交代了當時文藝界與社會生活層面的一些問題。

鄭：在背景資料中，《星島日報》一九四九年秋天發表的困叟〈從「如要停車乃可在此」說起〉一文，對香港十九世紀末以來的文化氣候概括得較清楚。從此脈絡來看，稍早的如嚴肅之〈表現香港的起點〉、秋雲〈香港有值得寫的題材嗎？〉、司徒懷白〈香港的賣文者〉等，雖是個別的意見，並不是年度的概況和報告，但也可以看到當時一些在香港的文學工作者如何處理香港題材、如何寫作或想像香港，及其抽象或實際的衡量。另外，在這些背景資料裏也清楚看到南來文人要求戰鬥性的問題，尤其是司馬文森〈談加強時間性、戰鬥性和地方性〉、盧敦〈清潔運動與組織兄弟班〉等文章。總括來說，背景材料可分為幾方面，第一是有組織性的活動，第二是南來文人對政治性的訴求，第三是個別作家對如何寫作香港的思考。

黃：困叟一文基本上就是就香港立場對香港文化情況作自我檢討。至於秋雲則有點居高臨下，以黨的組織政策駕馭香港的情況，他曾提出香港是否有值得寫的題材，但並不是從香港立場出發，而是集中在如何抨擊國民黨官員，並及內地流亡青年的情況等，離開了香港實際問題，而把香港納入整個華南、乃至整個中國的社會政治變革情況來考慮。從這些背景資料可見，南來文人雖然是談香港，但目的並非為香港。除了部分本地的作者如柳木下、困叟等人外，本地聲音是頗為微弱的。這段時期香港文壇雖然活躍，但對香港本地文學建設來說，關係其實不大。因此，這段時期可說是「在香港」的文學，而非香港文學本身主體性的建設；對中國整體的文學史，卻有很特殊的貢獻。

鄭：剛才黃先生提到秋雲等人的態度，正反映了他們如何處理香港題材，如何寫作與想像香港，即要把

香港歸入華南或更大的中國狀況去處理；如從反面的觀點來看，這等於是另一種對香港的要求，抹煞與壓抑其實也是一種做法。

盧：他們能否真的做到，是另一個問題。

鄭：香港有許多人不要這類型的作品，如經紀拉、望雲等人根本不會寫這些文章、提及這類事情，所以我們看文獻資料時，他們的聲音似乎很大，但實際是否如此，仍有待再考證。

盧：這一點很重要。《國共內戰時期（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香港本地與南來文人作品選》可能給讀者的印象是他們是主流，擁有強勢的聲音，但實際上對本土的讀者，或本地流行作家，可能是沒有影響的，只是他們一廂情願地認為需要在香港推動有關的思潮，這種情況並不是首次出現，在三十年代時，南來的文人也如此。

黃：因此，這基本上是中國現代文學史的一部分，多於作為香港本土文學史重要的一章。

（四）「文化漢奸」問題

鄭：首先是通緝《華僑日報》岑才生問題。廣州行營其實治權不及香港，發通緝令只能虛張聲勢，或頂多是道德審判，完全無實際作用。因此可能是《國民日報》的國民黨報人對岑氏不滿，才到廣州弄這場「隔山打牛」的事件；另一可能是在香港有實質利益衝突，而引起《國民日報》對岑才生的不滿。無論是甚麼原因，反諷的是，由於《國民日報》姿態太高，反令港英起戒心，生怕右派勢力插

手香港事務，因為當時國民黨曾提出香港主權問題，甚至擔心廣州老遠伸手干預港內政，結果《國民日報》反招短期停刊之懲罰性嚇阻。這是否還有其他內幕，目前的材料仍不能提供清楚的答案。第二個是戴望舒問題。他在香港淪陷時期主編過改稱爲《香島日報》的《星島日報》副刊，在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戰勝利前夕，還參與日本人創辦的「香港文化聯誼社」。雖然戴望舒的問題較爲複雜，但勝利後對戴望舒的針對性則較凌厲。關於這兩個問題，是否可以請兩位補充一下？

盧：「文化漢奸」這個題目是用了引號的，爲的只是希望呈現當時曾發生過的事件。這是戰後很敏感的問題，極少人願意提及。我們把它列爲一項，是因爲牽涉左中右三個不同政治立場的報刊，從中可見他們之間微妙的政治角力。剛才提到的第一個問題，我無法回答，因爲在字面上找不到任何線索，看到他們有任何利益衝突，也沒見有關人士的回憶文字提到這個問題，這可能與他們敏感或身份曖昧有關。我同意你剛才所言，《國民日報》的高姿態令問題白熱化，且逼使香港政府要用法律來表態。我們該重視香港政府對執政國民黨的態度，它對國民黨可能威脅香港治權很敏感，所以雖然港英政府懲罰《國民日報》停刊一個月，但其實在三天後已經讓它復刊。因此，港英政府不過是表示一種態度，這態度就是讓國民黨明白不能在港行使任何管治權，港英是有權干預的。《華僑日報》的新聞中曾仔細地說明港英政府用甚麼罪名來處理這件事，我們該在這裏得到一些啓示。

黃：從中國政治的角度去看，此事發生於一九四六年上半年。究竟對「文化漢奸」的整肅，會不會是國民黨想借「文化漢奸」的事件，以表明民族主義的立場，指導文化的開展？但是右派似乎沒有整體的文化政策，民族主義的立場，也不能抗拒左派的階級鬥爭的理論及政治變革的方向。此事後來也

不了了之。當然，此事發生後，對其他文化人也有一定的打擊，他們亦多不能為左派所容。由此使這些曾在日治時期工作過的文人，在戰後被「邊緣化」了，這樣的一段小插曲，當時很敏感，後來卻沒有下文。

鄭：我再追問一個問題。根據剛才黃先生提到的一點，及小思女士所提到的情況，似乎後來左派較願意接受在淪陷時期也曾介入過一些活動的陳君葆，但對葉靈鳳等人卻很排斥，為甚麼？

盧：剛才提到戴望舒的問題，戴望舒葉靈鳳在三年零八個月淪陷期，雖在香港編報紙副刊，他們只以純文學角度作編輯方針，工作只不過為了謀生，似乎不應該落了水。另外，戴望舒並非被國民黨檢舉，是給左派的人檢舉，看來，為爭辦「文協分會」的權力成份較多。後來，有人上報中央，夏衍認為此事並無問題，這在還沒有公開的戴望舒日記及他與友人通信中可見。後來中央也沒有再加以追究。葉靈鳳的問題則較複雜，因為他在三十年代開始便在上海結下樑子，他一向不被接納，與他是否漢奸無關。陳君葆則完全沒有問題，這是因為他一向與左翼關係良好，他是為了保留香港大學館藏圖書及香港政府的檔案而努力。日本人侵佔香港第三天，便已封存香港大學圖書館，並逮捕了他。後來他願意整理香港大學藏書及資料，功不可沒。

鄭：在日軍投降後，他幾乎立刻參加左右派的活動，兩方基於民族主義立場，都沒有排斥他。

盧：這與他本人有關，也與他的工作地點有關，他對左派的感情源於三十年代與茅盾等人的關係。他在三十年代香港淪陷前，已經與中國大陸的關係非常好，如鄭振鐸的書籍、中央圖書館的書籍都交給她保管，可見他超乎了左右派的政治立場。

(五) 方言文學

鄭：一九四七年方言文學有長達數個月之論爭，主要撰文者為華嘉（另一筆名孺子牛）、司馬文森、林洛、藍玲等。一九四八年一月由馮乃超、邵荃麟總結，肯定方言文學，並馬上獲茅盾、郭沫若回應支持。所以《國共內戰時期（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香港文學資料選》方言文學部分是由馮乃超、邵荃麟的文章開始的，在馮邵的總結文章發表後，茅盾、郭沫若回應支持，稍後更進一步把理論與實踐結合，其中有華嘉的文章、陳殘雲的短篇、樓棲的長詩、還有薛汕的潮語長篇小說和詩歌等。這些創作見於本書第四輯乙部，這是當時的一般情況。其次，整個論爭在總結後，比較激烈的主張是完全要用廣東方言寫作。背後的理論根據似乎是延安講話裏提到的「群眾的語言」、「人民大眾的諺語」，目的當然是大眾化。對廣東和香港而言，就應該是廣東口話，但事實上如果全部用廣東話寫作，作者和讀者都得重來一次「語文革命」，當時恐怕根本辦不到。廣東話的口語和書面語之差距，遠遠超過以北京話為底子的普通話，因此完全「我手寫我口」在粵語地區其實行不通，甚至得不償失，除非所有作品只是用來誦讀、廣播給一般群眾聽。如「中原劇藝社」的廣播劇自然可以徹底的廣東口語化。第三，馮乃超、邵荃麟的總結文章反對吸收方言，將方言提煉，與書面語的白話文結合。今天回顧，他們的「反揉雜」論點似乎太極端。因為這樣一來黃谷柳的《蝦球傳》也不合格，更不要說一九四九年經紀拉的《經紀日記》把方言與文言的結合，令整體效果更為生